抗战时期的张恨水

朱显亮

以笔弯弓

1936年秋，成舍我到上海创办《立报》，倡导“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逐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敦请张恨水主编其副刊“花果山”。尽管张恨水不习惯喧嚣的“十里洋场”，但在该报抗日救亡方针的吸引下，仍然答应帮忙三个月。年底，三月约期既满，张恨水正准备北归，却在一夕之间接家中两份急电，告知日本特务在北平搜捕新闻、教育两界反日人物，张恨水上了黑名单。

其实，日本人的黑名单上有张恨水，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张恨水的反日情绪早已为日本人所知。早在1919年，在芜湖《皖江日报》工作时年仅25岁的张恨水，就带领工友近二十人上街游行示威，声援芜湖学生运动，抵制日货，被芜湖人称为“爱国义举”。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杀害我外交人员蔡公时，制造了“济南惨案”，张恨水又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耻与日人共事》、《中国不会亡国》、《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等杂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寇氛日深，张恨水即把他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的《太平花》增加了抗日内容，该书出单行本时，作者在自序中说：“而九一八难作，……自八回起，辄改其非战小说，而为主战之论。争城争地之人物，尽易为执戈为国之健儿。苛捐杂税之穿插，亦改为外人铁蹄蹂躏之事实。”自《太平花》始，张恨水“以笔弯弓”开始了抗战小说的创作。1931年发表于北平《晨报》的长篇小说《满城风雨》描绘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赶走外寇，光复县城，堪称《太平花》的姊妹篇。1932年—1934年张恨水又创作了《似水流年》、《锦绣前程》、《美人恩》、《啼笑因缘续集》、《东北四连长》等抗战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经过感情的挫折和现实的坎坷，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抗日的洪流，描绘了一个个“全民抗日”的蓝图，寄托了作者武装民众保家卫国的理想。1932年发表于北平《新晨报》的历史小说《水浒别传》亦以北京沦亡的历史隐喻“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的亡国危机。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野心昭然若揭，然而国民政府仍压制抗日呼声，张恨水“心焚如火，百痛来侵”。创作并自费出版了《弯弓集》。该集是小说、诗词、笔记、剧本合集，“弯弓”隐喻“弯弓射日”之意，封面画即是一男子在张弓射日，扉页题词：“敬以一滴热血贡献给敝国的读者。”作者在自序中明确提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言，则亦可稍稍自慰矣。若曰作小说者，固不仅徒供人茶余酒后消遣而已。……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弯弓集》是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赞歌，在它的“英雄谱”中没有达官贵人，只有普通的工人、渔妇、下级军官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同时集中《咏史诗》、《健儿词》等诗作还集中表现了作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山万里图”的民族气节和为国捐躯的壮志。

尤值一提的是，张恨水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的一次正面交锋。土肥原不但凶狠而且象狐狸一样狡猾，他到处结交文化界知名人士，宣扬“中日亲善”，采取攻心战术，妄图削弱抗日力量。张恨水这样一位“妇孺皆知”，而且以笔弯弓射日的作家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命人携《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各一部，请张恨水“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改赠《啼笑因缘续集》，上题“土肥原先生嘱赠”，落款“作者时旅燕京”。“嘱赠”，说明书是被索取，而非自愿赠送，不写自己姓名则表示不愿与之为伍，一个“旅”字更喻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居无定所的境况，而且所赠之书又是描写东北义勇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这无疑回敬给了土肥原一记响亮的耳光。

拉拢即告失败，搜捕在所难免，因此，张恨水在黑名单上“榜上有名”，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有家不能回，又不喜欢上海淫糜的生活环境，于是张恨水旅居南京，在朋友叶古红家，渡过了一个“只把微醺度岁阑”的孤寂愁苦的除夕之夜。

辗转入川

1936年，张恨水举家迁居南京，并有了自己的事业，当了“老板”。他与离开《立报》的张友鸾创办了《南京人报》。张恨水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

解放前，私人办报一般都有坚实的经济靠山，接受“后台”的“津贴”，象张恨水这样全凭稿费，用血汗钱办报的，绝无仅有，创办时还动用了夫人胡秋霞的私房钱。然而，这样一份资金不足的小报，因张恨水的号召力，得到文朋报友的鼎力相助和报社同仁的无私支持，4月8日创刊即迎来了“开门红”，销出一万五千份，张恨水在副刊南华经上同时连载《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两部小说，其中《鼓角声中》是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1936年张恨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风雨之夜》在南京《中央日报》连载，以风雨之夜象征民族危机，全力表现义勇军抗日斗争，但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被腰斩。

张恨水曾风趣地称《南京人报》为“伙计报”，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办得有声有色，零售量和订户不断增加。然而倾巢之下，岂有完卵。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战争阴影笼上城头。昔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置东北华北沦丧于不顾，沉醉于偏安迷梦中的达官贵人，在炮火中作鸟兽散，“六街灯黯满城秋”，人心惶惶。《南京人报》销量骤跌，陷入困境。然而报社工作人员谁也不愿停刊，表示“玩命儿苦撑到底”。张恨水为大家深情所感，把家眷从丹凤街疏散到城外十八里上新河的小渔村，坚持办报。每天下午到报社处理事务，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休息。往返几十里地，穿梭于炮火的烟雾之中。愁困交加，不久，张恨水病倒，无奈之下，张恨水将家眷送到安庆，自己亦于11月初到芜湖就医。12月8日，《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1937年冬，张恨水携眷回到故乡潜山。在家乡走亲访友之际，他积极宣传抗日，赢得了潜山各界的好评。12月13日，应潜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之邀，张恨水做题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的惨景，揭露了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的罪行，并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汉奸卑劣下贱、出卖灵魂的丑恶行经。其中提及汉奸侯少福搭救他的事。原来，“九·一八”事变后，有一次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被反动军警抓上囚车。这时，一个戴墨色眼镜的人赶上前，将张恨水从车上拽了下来，并朝他脸上打了一耳光，说“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胡闹，还不给我滚回去！”张恨水抬头一看，原来是老乡侯少福。尽管当年侯少福救了他，但张恨水大义灭私情，他愤慨地说，如果我今天见到他还在当日寇的鹰犬，我一定要剖开他的胸膛，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看看他长的什么心肝。有意思的是，这次演讲一个多月后，侯少福即受日寇派遣回潜组织维持会，因张恨水揭露在先，迫于舆论压力，潜山县政府当即将其逮捕并处决。这件事，在家乡潜山传为佳话，有人撰联赞曰：

为国家仗义执言，持干弋以卫社稷，生当如斯；

向倭寇摧眉折腰，摇羽扇而惭乡闾，死有余辜。

12月14日，张恨水又应邀到梅城小学做题为《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演讲，演讲中他分析了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多种因素。第一我们是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第二，日本岛国，资源贪乏，人口也仅有我国的零头，兵源不足，我国幅员辽阔，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大，兵力就越分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第三，日寇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激起了敌占区人民的仇恨，地下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这样内外一致，全国一致，军民一致，长期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通过这篇演讲，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对国际局势及敌我双方国情的清醒认识，同时亦可看出张恨水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这种自信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是人民群众巨大的抗日力量，侵略者必将淹没在二者的汪洋大海之中。

1937年12月底，张恨水将家眷安排到老家黄岭老屋，只身西行至武汉，与从南京撤退下来的四弟牧野会合。此时，南京已陷落，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央政府先后迁往临时首都武汉和重庆，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自己的事业在敌寇的炮火下灰飞烟灭，家眷亲属也在战火中辗转流离，国恨家仇激励着张恨水，他已不满足于做文字工作去唤醒民众，而要放下笔杆拿起枪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因此，当牧野提出召集在武汉的潜山青年，回到家乡大别山中去打游击时，张恨水怦然心动，毅然呈文武汉国民政府第六部，表示不要任何物质支援，资金和武器皆有自己解决，仅仅要求政府承认这支队伍的合法性，以免和其他武装发生冲突。然而，国民政府要“包办抗日”，呈文如石牛入海，一去不回。

“抗日有罪”、“请缨无门”，怀着满腔悲愤的张恨水，西行入川，于1938年1月10来到陪都。

坚守“关头”

1938年初，《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张恨水受邀主编副刊《最后关头》。他明确提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敌及唤醒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他以“关卒”等笔名发表于该刊的诗词杂文，嬉笑怒骂，犀利泼辣，无不直接为抗战服务，大快人心，却让国民党当局很不自在，多次进行所谓新闻检查。迫于政治压力，《最后关头》于1941年10月9日停刊后，《新民报》推出另一专栏《上下古今谈》，仍由张恨水主编。《上下古今谈》，虽笔调有所改变，但立场不变，张恨水借古喻今，于温婉沉静中讽喻社会，表达进步主张。从《最后关头》到《上下古今谈》，张恨水持续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迷雾，为驱逐日寇而摇旗呐喊，努力地做着一个忠实的“守卒”，坚守着祖国的“最后关头”。

抗战期间国事艰难，张恨水的生活困顿不堪。自1940年起，他携家眷移居重庆市郊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风雨来时，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屋外雨已停，屋内仍淅沥，他自嘲地称之为“待漏斋”。吃的是用来食用沙子太多，用来盖房沙子又太少的“平价米”。张恨水在重庆始终穿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衫，出席会议时，为遮掩长衫上的破洞，就套一件旧马褂。当时穿马褂的人已不多见，所以他和《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被人戏称为“重庆新闻界两马褂”。

然而，精神的重负、物质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改变他守节不移之心。重庆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投到官僚门下，充任清客。张恨水做为文化名人，多次被人相请，但都被他拒绝。他不仅律己，还以同样的人生态度劝慰朋友。当听说有人请张友鸾出任“主任”时，张恨水画了几棵松树，题了一首七绝送给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

张恨水的正义感和鼓吹抗战的立场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时代潮流合拍，在时代的主旋律面前，他和共产党和新文学作家更多地走到一起。视野的开阔，革命力量的影响，加之“精进不已”的创作精神，使他的文学观从“叙述人生”上升到“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高度，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性、写实性和批判性。在渝八年，他先后创作了《疯狂》《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大江东去》、《魍魉世界》《八十一梦》《水浒新传》《虎贲万岁》等十多部中、长篇讴歌抗日志士、揭露重庆政治黑幕小说。这些作品有些发表于敌战区，有些还在抗日根据地发行，影响广泛。一位苏州小姐因读《虎贲万岁》而心仪作战指挥余程万，做了他的太太。一篇小说成就千里姻缘，传为佳话，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张恨水抗战作品的深远影响。

张恨水留下的三千万言的文学宝库中，有关抗战的作品达八百万言之多。张恨水致力于抗战文学的创作，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情关怀与鼓励。1942年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新民报》主要工作人员时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1944年6月，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重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同志接见参观团时，特向赵超构询问了张恨水的近况，并称赞说“《水浒新传》这部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辽，我们八路军抗日。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配合我们的抗日战争，真是雪中送炭。”他文学观的飞跃也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肯定和赞扬。1944年5月，张恨水五十寿辰之际，重庆《新华日报》刊专文祝贺。文中指出：“他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个分水岭，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潘梓年先生在《新民报》发表文章称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是一位“坚持不懈，精进不已”的作家。老舍先生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文章说：“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恨水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2月，张恨水离开重庆，经潜山、安庆、南京，辗转返回北平。

**作者简介：朱显亮，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秘书长。**